

农民与市场

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

潘维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Politics of Marketization in Rural China:

The Coalition between Grassroots Authorities and Rural Industries

农民与市场

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

潘 维 著

商务印书馆

2003 年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与市场: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/潘维著.

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3

ISBN 7-100-03926-6

I. 农… II. 潘… III. 农村—问题—研究—中国

IV. F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971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农民与市场: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

潘 维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3926-6/F·471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

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张 14 1/4

印数 5 0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谨以此书向陈翰笙先生致敬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绪论	5
一 农村集体,乡镇企业及产权	8
二 全书章节介绍	17
三 资料来源	22
第二章 市场化与农民	25
一 国家与社会两分法	26
二 “市场化”框架里的农村基层政权	32
(一)市场化与受掣肘的国家	33
(二)市场化与瘸腿的私有经济	39
(三)市场化与健全的农村集体	42
三 市场化与市场中介	56
第三章 农村的社会主义传统	62
一 公社企业的兴衰	64
(一)公社企业的兴起:激进主义	64
(二)公社企业的衰落:粮食生产的失败	67
二 社队企业的兴起	70

2 农民与市场

(一) 成就	70
(二) 以往的解释	72
三 社会主义传统	74
(一) “社会主义优越性”	75
(二) 社队企业与农村大集体	81
(三) 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模式	84
(四) 工业集体与粮食	87
四 “河边”的危机	91
五 小结	102
 第四章 进入市场的农民——输家	104
一 仁寿事件	105
(一) 概况	106
(二) 213 国道	107
(三) 前奏	109
(四) 事件爆发	114
二 失败的中介	118
(一) 个体农民的自助	121
(二) 半瘫痪的仁寿基层政权	123
三 生产责任制、农村干部、乡镇企业及市场化	130
(一) 生产责任制	132
(二) 生产责任制、农村干部和乡镇企业	135
(三) 乡镇企业与市场化	139
四 小结	144
附录：小岗农民访谈录（陈窗 曾德方）	148

第五章 进入市场的农民——赢家	162
一 争夺工业资源	166
(一) 获取资金	167
(二) 获取技术	171
(三) 腐蚀计划体制	174
(四) 行政资源的商业化	180
二 集体竞争的优势	188
(一)“回到未来”的村庄(江苏)	190
(二)“回到未来”的村庄(山西)	198
(三)“回到未来”的村庄(陕西)	203
(四)“回到未来”的村庄(河南)	207
三 小结	219
第六章 同一主题内的变奏曲	224
一 关于例外	226
(一)温州的家庭作坊与基层政权	226
(二)珠江三角洲与香港	235
(三)苏南与上海	240
二 四种中介模式及其社会结果	243
(一)温州的农村社会	246
(二)四川盆地的农村社会	255
(三)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	277
(四)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	286
三 苏南地区的私有化躁动	303

4 农民与市场

四 小结	316
第七章 乡镇企业死了,乡镇企业万岁	320
一 “转制”是政策的结果	322
(一)“转制”是政策的结果	322
(二)“转制”的非意识形态原因	326
二 导致政策的意识形态	331
(一)关于乡镇企业的亏损与负债	336
(二)关于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基层政权的干预	343
(三)关于“灰色”市场	362
(四)关于支持私有化的案例	365
三 乡镇企业万岁	366
第八章 结论	374
一 中国农村“市场化”的政治学	374
二 中国农村的未来	380
三 本书结论的启示	384
附录:乡镇企业之后的“三农”问题	397
文献索引	415

图 表 目 录

1-1:农村基层组织情况(1978—2001)	9
1-2:乡镇企业的类型及基本数据(1994)	10
1-3: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产值(1990—1994)	11
2-1:中国粮食产量(1950—2002)	59
3-1: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(1962—1978)	82
3-2(1):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(1978—1994)	99
3-2(2):乡镇企业的发展(1995—2002)	100
4-1:江苏、安徽、四川三省农村工业发展之比较	139
6-1: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四个典型地区	245
6-2:苍南县和全国教育水平比较	249
6-3:B乡政府的收入与支出	260
6-4:W县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四川省和全国的比较(1991—1994)	272
6-5:广东和江苏概况	278
6-6:广东和江苏乡镇企业(1994)	278
6-7:广东和江苏乡镇企业的出口(1994)	278
7-1:江苏和浙江乡镇企业工业比重示意图(1994)	327
7-2:江苏和浙江乡镇企业工业比重示意图(2001)	328
7-3:乡镇企业流动资产拖欠比例(1993—2000)	330

6 农民与市场

7-4:全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(1991—2002)	333
7-5:乡办企业发展速度(1991—1995)	334
7-6:村办企业发展速度(1991—1995)	334
7-7:私营企业发展速度(1991—2001)	335
7-8:集体、私营企业亏损状况比较(1992—2001)	338
7-9:乡镇集体企业资产负债率(1991—2001)	340
7-10:农村人均纯收入(1978—2002)	348
7-11: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比例(1991—2001)	350
7-12:农村人均乡镇企业劳动报酬(1985—1999)	350
7-13:乡镇企业单位数(1990—2001)	351
7-14:优胜村的社区支出	353
8-1:改制前的农民与市场	381
8-2:改制后的农民与市场	382
8-3:未来的农民与市场	383

前 言

人们常说,与改革前相比,中国出现了惊人的繁荣与进步。我赞同这个看法。然而,我试图通过一项农村工业发展的研究来说明,历史没有被1978年切断,改革前的中国与改革后的中国之间有一座精致漂亮的桥梁。我研究这两段历史之间的桥梁,说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来自改革前原有的、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的基础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组织。一座原先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桥梁,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繁荣昌盛铺平了道路,也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治稳定构筑了坚实的基础。

我的专业是世界政治,以研究和教授比较政治体制为生。却因早年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硕士学位,早有“青出于蓝”、做点中国农村研究的弘愿^①。陈先生也并不专做农村研究,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率领薛暮桥、孙冶方等当时的年轻人做过出色的农村调查,取得了迄今仍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。

我于1993年初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农村,1995年底结束,1996

^① 陈翰笙,生于1897年,在美国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,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,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,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中共现存的最资深党员。他在学术上成就卓著,并在海内外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功勋,更以横跨三个世纪的生命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进步。

年4月写成了这本书,迄今已近十年。书的原文是英文,为我在美国赚得了博士学位。因为观点不同于主流,答辩后立即获得了美国一家大出版社的出版合同。但回国后发现情况变化非常快,便一直踌躇到今天仍未付梓。用英文写本书很不易,此生大约就此一次,我想还是等乡镇企业的变化进程结束后,证明自己的观点仍有价值,做了应有的完善,再在美国出版。如果结论经不住时间考验,对知识没什么贡献,也就可以无悔地放弃。出版一本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书,没什么意思,也愧对自己的老师们。回国后,有同事听到我的观点,认真地指出其与官方政策相左的危险,我也就打消了出中文版的念头。此后忙于授课,研究兴趣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,认为“民主迷信”是个极有趣的事,就把这部书稿束之高阁,印象逐渐淡了。

到2002年,随着乡镇企业的进程进入尾声,“三农”又成了举世关注的严重问题。我才想到,自己十年前的研究仍有不错的现实意义,可能对专业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有所启发。同时,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里读过这部书稿的朋友也多了,反馈是积极的。因为书的现实意义,他们鼓励我首先出中文版,并且补充一个对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总结。而今,中国的出版业呈现空前繁荣。恰逢北京因“非典”(SARS)肆虐而停课,有时间为这本书做些补充。光阴似箭,让这部书稿“与时俱进”已经不可能了,况且脱离农村研究已久,我已无力详细修订原稿。主要是根据最近一年的实地调研,增加一章对乡镇企业消亡的评论,完成一个夙愿。

当然,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满足私愿。通过一项具体的农村事务研究,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学界主流的抗议,直指当前经

济学界的“私有化”迷信和政治学界的“海选”迷信。

还应当说明,本书前后的语言风格有较大差异,是因为我用中文思考和写作比用英文思考和写作熟练得多。从欠流畅的英文再翻译成中文,很难抹去欠流畅的痕迹。

能够完成这本书,我首先要感谢哈佛大学 Elizabeth. J. Perry 的悉心指导。作为论文委员会的主席,她阅读了我的英文版博士论文的每一稿,仔细到为我一句句地订正语法、句型和用词。回国这么多年,自己除了继承她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精神,在学术上没什么成就,愧对导师。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其他成员,即加州伯克利大学的 Robert Scalapino、Lowell Dittmer 和 Thomas Gold。感谢犹他州立大学的童燕齐,当初与这位老同学的讨论是激发这条思路的最初因缘。特别感谢中央党校的刘德喜,这位老同学邀我参加一项资料收集工作,为我去全国各地实地调研提供了重要帮助,并为我提供了他收集来的全部资料,构成了我第二手资料的重要来源。后来,这些资料的大部分录入他主编的两卷本《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》(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)。感谢康奈尔大学的段宏和哈佛大学的尚英为这本书的翻译、资料、图表所做的大量工作,感谢老朋友杨学军为本书出版耗费的心血。感谢为我进行实地调研提供帮助的所有企业家、政府官员、农民、工人和学者。感谢一切为此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朋友,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们。缘起不灭,大家的情谊永在我心里。

能完成这本书,归根结底,应当感谢陈翰笙先生。作为我学术

4 农民与市场

生涯的第一启蒙人，他启发了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兴趣。这本书题献给中国学界共同的“翰老”，学生以此向恩师表达永远的敬意。

当然，作者为此书的观点，乃至书中所有的错误和疏漏负全部责任。

第一章 绪论

到 1995 年,改革开放才 15 年,中国就成为亚太地区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,同时也是政治奇迹。

中国城市的繁荣令人眼花缭乱。城市繁荣背后的支柱是大规模的农村工业,农村工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。中国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农村劳动力。他们吃苦耐劳,工资极低,为全世界源源不断地生产工业制品。

中国农村工业化 15 年(1980—1995)的成就是本书的研究重点。作者力图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村有的地方能够走上工业化道路,有的地方不能够。本书第三章讨论乡镇企业之前的社队企业,第七章讨论乡镇企业的私有化。私有化运动始于 20 世纪末,在 21 世纪初完成,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乡镇企业。因此,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村集体工业的完整历史。到本书出版的 2003 年,这段历史长达半个世纪。

然而,本书既不是一本历史书,也不是一本乡村工业经济史,更不是经济学著作。这本书是政治学类的著作,旨在从政治的视角理解中国农村经济,理解中国的政治奇迹。所以,本书的英文版标题是“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过程的政治”(Politics of Marketization in Rural China)。

对作者而言,乡镇企业的历史不过是说明道理的工具,是道理

的载体。在乡村中国变成城市中国之前,在中国农民被减少到10%以前,作者希望这本书阐述的道理一直有效,能对读者有启发。

中国农村工业的主力军是“乡镇企业”。乡镇企业指的是乡或村政权全部或部分所有的企业,或至少是在这两类“基层政权”庇护下运作的乡村企业。在1980年到1995年这15年中,乡镇企业以每年30%到40%的速度扩张,成长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庞然大物。在农村基层政权的带领下,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竞相争夺资源和市场,促成了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中国工业市场。

面对如此惊人的经济巨变,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基层政权模式却安之若素,并没有显得与现实脱节或不适应。人们总说农村应当进行彻底改革。可是,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,尽管农村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,农村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与毛泽东时代却依然相似。

在人民公社时代,农村集体同时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力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农村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:难道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大趋势没有根本冲突?难道这种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在市场化进程中又焕发了新的活力?同样有趣的是,在市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,中国农村地区基本保持稳定,没出什么大乱子。有相当成熟的研究表明,在发展中社会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,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或者农民革命^①。可是,虽然中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在改革的前15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

^① 关于相关的研究,见 James C. Scott, 1976; Eric R. Wolf, 1969; Joel S. Migdal, 1974。

却没出现过什么针对市场或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普遍抗议运动。农村社会一直到 90 年代中的长期稳定可谓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治奇迹。这是否与中国农村基层的政治体制相关呢？

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，中国的农村改革显得格外顺利。80 年代初，中国顺利地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。自 1984 年起，中国逐步开放工业产品市场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向前迈了一大步。中国农村经济的严重恶化是 21 世纪初才出现的事情。

固然，中国农村从未享受过完整的社会主义福利，废除集体农业不会给农民带来什么损失，所以改革得以顺利推行^②。可是，**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会导致农村工业发展**。首先，回归家庭耕作不过创造了两亿多独立的个体农户。对小农而言，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并不比国家计划更友善。小农自身的生存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岌岌可危。所以，回归家庭耕作谈不上促进农村工业化。其次，中国的耕地尚属农村集体所有。一旦耕地私有化，农村的市场化只会加速小农的破产，促使更多生计无着的农民涌入城市。尽管我国城市发展很迅速，但直到改革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，依然难以吸纳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力。最后，中国农村兴办工业的条件非常恶劣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中国农民与城市长期隔离，既无知识也无“关系”，更缺少资本。在 80 年代初期，中国的工业市场才刚刚兴起，大部分原料和市场都还在计划控制之下。这样的“市场”，对惯于“规避风险”的小农是非常残酷的^③。

② Jeffrey D. Sacks and Wing Thye Woo, 1994.

③ James C. Scott, 1976。他详细讨论了小农规避风险(risk aversion)习惯的社会基础。